

斩断地方公款存储灰色利益链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郑良 魏董华

近日,福建龙岩、湖北等地对党员干部利用公款存储谋私逐利问题进行专项整治。“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公款存储利益输送“潜规则”在一些地方长期存在,案件频发。有的银行通过向有公款存储决定权的领导子女、配偶等提供岗位、高额回扣、高额绩效收益等进行利益输送,争抢规模巨大的公款存储“蛋糕”。

利用公款存储谋私逐利

近日,一场整治利用公款存储谋私逐利的行动在福建龙岩展开。“力度之大前所未有。”龙岩市监察局副局长黄佐清介绍,全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1万多名干部填报了自查表,并作出没有利用公款存储谋私逐利的书面承诺,撤销不符合规定的银行账户,15家存在这方面问题的市直单位主要负责人被约谈,在规定时间内要完成整改。

截至目前,龙岩市共清理填报银行账户9324个;撤并银行账户854个,撤并资金5.83亿元。

龙岩此次专项整治部分源于落马的前市委书记黄晓炎受贿案。去年7月,龙岩原市委书记黄晓炎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目前这起案件仍在审理中。

当地多名银行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黄晓炎及其家人利用公款存储谋利是公开的秘密。黄的妻子在厦门的一家商业银行任职,这家银行在龙岩原本没有设网点,黄调到龙岩任市委书记后,该银行很快在龙岩设立分支机构,黄的妻子是筹建分支机构的负责人之一。

“两三天时间,原来存在其他银行的存款迅速被‘搬运’到这家银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公款存储占绝大多数。不

少银行负责人叫苦不迭,但也没办法,都知道背后是市委书记的影响力。”龙岩金融系统一名负责人告诉记者。

龙岩的此类现象并非孤例,多地曾出现相关案情。记者调查发现,利用公款存储谋利正成为利益输送新手法。

2014年11月,中央第五巡视组向浙江省反馈巡视情况时提出,利益输送出现新的表现形式,手法隐蔽,其中就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利用公款存储谋利的情形。

2015年7月,贵州省委专项巡视组对12所省属高等院校和3家医院及卫生机构进行专项巡视后指出,多数单位存在公款私存违纪现象。

今年8月,湖北省纪委、审计厅对省、市、县、乡四级领导干部、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中层副职(含)以上负责人以及负责公款存放管理的其他人员借公款存放谋取私利进行专项检查,规范党政机关及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公款存放行为,防止发生利益冲突和利益输送问题。

领导干部成银行重点“公关”对象,亲属收回扣拿高薪

“商业银行都有揽储任务,银行分支机构有存款数量考核指标,揽储有‘公关费’‘宣传费’等专项开支,用于‘款待’‘公关’重点客户,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公款体量大、来源稳定,是各大银行争抢的‘大蛋糕’。”龙岩市银监局纪检组长练胜祥告诉记者。

有公款存储决定权的领导干部是各家银行重点“公关”对象。据多地纪委办案人员介绍,除高档宴请、报销发票、安排旅游、赠送购物卡等常规手段外,更隐蔽的是银行安排公款单位领导的配偶、子女或其他利益关系到银行任职,能带来大笔

存款的还能得到超常规提拔使用,每年可获取数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绩效收入。

——领导拍板存款,亲属在银行拿高额绩效。浙江台州市黄岩区原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金小云2014年被查处,纪检部门调查发现,金小云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影响为子女谋取利益,亲自出面跟自己分管的部门打招呼,要求他们把单位公款存到其子工作的银行,帮助其儿子获得存款提成百万余元。

多名银行业内人士透露,一些在银行任职的领导干部亲属之所以热衷于“开疆拓土”,大肆揽储,秘密就在于银行给予其高额绩效奖金。

——银行直接给拍板存款的领导高额回扣。江苏省财政厅原副厅长张美芳受贿案中,张美芳利用其决定巨额财政资金存放在哪家银行的权力,收受银行大额回扣,这些款项成为其受贿主要来源。

——给公款单位重要领导的子女、配偶或特定关系人位子,甚至超常规提拔。龙岩一家市直单位主要负责人的儿子4年内换了3家银行任职,待遇优厚,其“敲门砖”就是该领导任职单位的基建账户及大额资金,都随着该领导儿子任职银行变动而变更。

据杭州市纪委相关人员介绍,2015年2月至3月,杭州上城区市政园林管理所所长胡某为帮助其在银行任职的亲属解决编制问题,在未召开班子会议集体讨论的情况下,与副所长宋某口头商议后,要求财务人员将500万元资金存放到胡某指定的银行内。

多名银行业内人士透露,“一些商业银行为了揽储,甚至提供支行行长、副行长、部门经理等领导岗位,只要揽储能达到一定金额,就能当上银行领导。”

多地建立竞争性存储和回避制度

龙岩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李成荣说:“要从规范权力运行的源头着手,建立公开透明的规章制度,杜绝暗箱操作,斩断利益输送的‘暗道’。”

记者调查发现,福建龙岩、浙江、湖北、江苏等地通过建立公款存储集体决策、公款招投标等竞争性存储、公款存储回避等制度,防范公款存储利益输送风险。

龙岩市提出,单位经费、项目资金存储到哪个银行要集体研究、形成记录,并在单位内部公示,银行给什么好处也要在单位公开;有存储决定权的领导干部、财务人员,以及与资金管理有关人员不得将本单位公款存储在本人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和其他特定关系人所在的金融机构。

针对一些领导干部利用公款存储谋利问题,浙江省委明确:公款存放银行时,必须采取公开招标等方式进行竞争性存放,并纳入各单位“三重一大”集体决策事项,本单位领导干部有亲属在银行任职,进行公款存储决策时,该领导干部要主动报告并予以回避。多名业内人士表示,银行通过利益输送争夺公款存储,易引发恶性竞争、加大运营成本。一些银行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拉关系、走后门上,不注重改善服务质量和产品创新,削弱了竞争力,不利于行业长远发展。

黄佐清说:“一些机关单位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存款资金并非自有资金,大多是因项目建设从银行贷款而来,高息贷款、低息存款,损失的是国有资产。”

记者采访了解到,各地在专项整治公款存储利益输送问题过程中,主要针对党员干部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处理,但对相关银行和工作人员并没有查处。练胜祥表示,银行为揽储直接向领导干部及其亲属给回扣、安排旅游、提供高档宴请等属于违规行为,同时也破坏了行业秩序,不利于银行业健康发展。为避免这类现象的出现,应同时加强对银行的监管力度,对涉及的人员坚决查处。



1934年5月,在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失守之后,中共中央开始酝酿战略转移。由于事关重大,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只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进行。为了筹划战略转移的相关事宜,中央书记处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政治、军事由博古、李德分别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落实和保障准备。

走留问题属于“核心机密”

长征之前,一般干部的去留,不是由中央组织局决定的。属于省委管的干部,由省委决定报中央;党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总工会等单位,由各自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报中央。决定走的人再由组织局编队。当时,中央政府党团书记是洛甫(张闻天),总工会委员长是刘少奇、党团书记是陈云。因此,这些单位的留人名单,是分别由他们决定的。而高级干部的去留,则是由“三人团”决定。

党中央、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人员的去留问题属于“核心机密”,留守人员名单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完全是由“三人团”决定的。在研究留守人员名单时,博古、李德只就军事干部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其他方面则只是告诉他一个数字。其实,高级干部的去留问题都是博古、李德说了算,具有很浓的个人感情色彩,存在明显的宗派倾向。博古、李德尽量将他们认为犯有“右倾”错误、不执行中央路线的人,留在中央苏区。

主力部队转移之后,红军留守部队将面临着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剿”。况且,留守部队大部分都是伤病员,甚至很多是重伤员,已经基本失去战斗力,一旦苏区陷入敌手,留守人员的前景就可想而知了。

最终的留守名单

留下来坚持斗争的领导机关叫“中央分局”。第一个

被考虑留下的是项英。项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中革军委副主席,具有党、政、军全面工作经验,委任他为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显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项英临危受命,表示坚决服从安排。项英为坚持南方3年游击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二个被列入留守名单的是时任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陈毅在兴国前线指挥作战时身负重伤,此时正躺在医院的病房里休养。陈毅只好服从中央决定,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委员、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与项英一道

参加长征的人员是如何确定的

□肖石忠 曾涛 孙杰

领导了艰苦卓绝的南方3年游击战争。

瞿秋白的名字也出现在留守名单里。对于这个决定,很多人有不同的意见,毕竟瞿秋白曾是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找到博古等人,希望能把瞿秋白带上,但博古予以拒绝,认为瞿秋白正患肺病,不宜长途行军。1943年12月,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曾回忆说:“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1935年2月,瞿秋白在突围途中被俘,后被国民党残酷杀害。

何叔衡是中共一大代表,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内务部代理部长和中央政府临时法庭主席等职,后因反对错误的“肃反”而被撤销全部职务。红军主力长征后,时年58岁的他留在根

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2月24日,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在长汀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

刘伯坚、贺昌、陈潭秋以及所谓“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毛泽覃、古柏等同志因此也上了留守人员名单。

曾经担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也差点没能跟随大部队进行长征。他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曾经反对过李德的瞎指挥,所以也被列入留守名单。后经周恩来据理力争,刘伯承才随主力红军一道长征。

起初毛泽东也没在长征名单之中

不仅是刘伯承,甚至连毛泽东一开始都没有在长征名单之中。红军转移出发前,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的首长警卫员都去供给处领被装物资,就去领毛泽东的那一份,但负责发放物资的干部在供给名单上却没有找到毛泽东的名字。曾任李德俄文翻译的伍修权在《我的历程》中写道:“当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经过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人极力争取,毛泽东才得以参加长征。

李维汉在回忆录中写道,关于留人问题,他未过问。何叔衡留下,是博古他们决定的,他没有参与其事。苏区中央局机关和中央党校归李维汉管,所以,他把他们都带走了。

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转移后,在中央苏区留下了红24师和地方武装共1.6万余人,以及3万余名伤病员。他们面对国民党军及地主武装的疯狂“围剿”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终因敌我力量悬殊队伍被打散,多数人牺牲、被俘。幸存部队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3年游击战,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